

飄逸不群的詩仙 別有傷心懷抱

談李白之從永王璘

張若香

在詩歌的長河裏，李白異才卓絕，詩篇靈奇壯麗。但他却是受褒貶最多的詩人，他的詩名載譽千古，無可置疑，但對於他在天寶亂中的從永王璘之亂，後世一直議論紛紛，成爲他生命中的遺憾。現析論詩人的遺憾是如何形成抑爲人誤解。

天寶十四年，安史之亂爆發時，李白正四方漫遊，之後他「自宣城之深陽，又之剡中，遂入廬山」（王琦注李太白年譜）。李白本已入廬山隱居，他是如何出而佐永王璘的？且看當時的政治形勢：

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佔據長安一帶，玄宗奔蜀，在逃出長安不遠，即發牛馬嵬兵變，結果楊國忠被殺，楊貴妃賜死。同時百姓及禁衛軍倡言殺賊，遮道請留。玄宗在此情況之下，使吩咐太子李亨以西北爲根據地，負責平亂，並曾傳旨將帝位讓與太子，「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，且宣旨欲傳位，太子不受」（資治通鑑卷二一八），於是傳位之事並未成實，玄宗便繼續幸蜀去。太子李亨在黃河上游靈武設軍營，以糾集西北邊地精兵。在抵達靈武後，隨從太子的百官重提玄宗曾傳位之命，勸太子即帝位，以便指揮抗敵，於是李亨就在靈武即位，改天寶十五年爲至德元年，是爲肅宗，尊玄宗爲上皇。此事關鍵在於幸蜀的玄宗並未能立即知悉太子已即位，同時接受房瑄建議，正下出分置的制詔，稱爲「制置」，內容爲「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，領朔方、河東、河北、平盧節度都使，南取長安、洛陽，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。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。永王璘充山南東道、嶺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節度都使，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，長沙太守李岷爲都副大使。……」（資治通鑑卷二一八）。照「制置」內容，李

璘是負責經營長江流域。肅宗登位後，便顧慮到江南是富庶之區，如永王撫定江南順勢北上，不難領先擊敗安史叛軍，與他平分天下；同時，據新唐書李璘本傳載：「見富且強，遂有闕江左意。以薛鏐、李召卿、韋子春、劉巨鱗、蔡嗣爲謀主……其子襄城王瑒，剛鬻乏謀，亦樂亂，勸璘取金陵。」於是肅宗在至德元年十一月命永王退回巴蜀，但永王認爲是受玄宗「制置」之命經營江南，而肅宗之即帝位，頗有擅自行事之舉，因而拒命繼續進軍。此一場肅宗跟永王的政治紛爭，使李白無端的陷入漩渦。

至於李白在怎樣的情況下成爲永王幕僚，千古議論紛紛。爲使李白不致沾上污名，後人便出而爲李白迴護，此事件始末，史無詳盡記載，據舊唐書李白本傳載：「白在宣州謁見，遂辟從事」，新唐書李白本傳則載：「永王璘辟爲府僚佐」，蘇軾云：「太白之從永王璘，當由迫脅。不然璘之狂肆寢陋，雖庸人知其必敗也。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，而不能知璘之無成，此理之必不然者，吾不可以不辨。」（詩人玉屑），王琦在太白年譜中列：「永王璘爲江陵府都督，充山南東路及嶺南、黔中、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，重其才名，辟爲府僚佐。及璘擅引舟師東下，脅以偕行。」此可見王琦認爲李白先爲府僚佐，而永王拒命東下在後。蘇軾與王琦之論都爲李白洗脫自願從永王謀逆之嫌。但當時李白隱居在廬山，據舊唐書永王本傳所載：「詔命歸覲於蜀，璘不從命。十二月，擅領舟師東下，甲仗五千人趨廣陵。」而廬山即屬廣陵郡內。新唐書地理志五：「揚州廣陵郡屬淮南道，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，漢九江、廬江、江夏等郡。廣陵、六安國及南陽、汝南、臨淮之境。」又中國地名大辭典「九江」條：「潯陽廬山

即屬九江郡地。」即永王兵到達此處，應是已拒命東下之事。至於李白後來「爲宋中丞自薦表」中所說：「屬逆胡暴亂，避地廬山，遇永王東巡，中道奔走，卻至彭澤。」以及「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」中的：「僕臥香爐頂，漁霞漱瑤泉。門開九江轉，枕下五湖連。半夜水軍來，尋陽滿旌旆。空名適自誤，迫脅上樓船。」李白寫此二篇詩文時已是帶罪之身，他應多方爲自己辯解，但他亦沒有用先爲府僚佐李璘後謀逆作申辯，只表示自己的隨永王是被迫脅。由這些可推斷永王召李白入幕府時，已是拒命東下之後。

至於李白是否被迫脅隨永王，且看他當時的永王東巡歌：「永王正月東出師，天子遙分龍虎旗。樓船一舉風波靜，江漢翻爲雁鴛池。」在「東巡歌」的第一首，李白便肯定的說永王是奉玄宗正命出征，不管當時李白知否肅宗已下了討伐永王之令，在他心目中，永王出征是名正言順的。其次，當永王由尋陽東進時，李白有一首「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」：「虜箭雨宮闕，皇輿成播遷。英王受廟略，秉鉞清南邊。」這裏亦在指出永王東巡是「受廟略」，也就是玄宗所定的「廟略」。「卷身編蓬下，冥機四十年。寧知草間人，腰下有龍泉。浮雲在一決，誓欲清幽燕。」這裏李白表現出無限興奮，完全是要借此機會大展平生抱負的氣概，很難感受出有被迫脅的情緒，反而表現出對永王東巡的樂觀。由此可見李白當時是豪情奔放的，完全沒有提過肅宗與永王之間的矛盾，亦未察覺事情的嚴重。

李白是如何進入永王幕府，在李白的詩中沒有詳盡可靠的記載，但根據當時的情況以及李白的性格，可得如下推論：

(一)舊唐書所載「白在宣州謁見」一項，沒有充份根據，且在李白詩文中完全沒有這個表示，同時李白在「與賈少公書」中曾說：「辟書三至，人輕禮重，嚴期迫切，難以固辭，扶力一行，前觀進退」，而此書中並有「唯當報國薦賢，持以自免」，可推斷此書應寫於幕府中時，並非失敗後的辯解，與上文所引述的「脅迫上樓船」、「遇永王東巡脅行」等看，李白當初不可能是自薦的。因此自動謁見之說並不可信。

(二)至於脅從或自願應詔而出一事，其實並不矛盾。李白當時雖在隱居，但他用世之心並未熄滅，當永王對他辟召時，他大概沒有立即應允。李

白在長期的漫遊生活中，仍念念不忘的是：「壯士伏草間，沉憂亂縱橫；投軀寄天下，長嘯尋豪英」（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），當這樣一個在亂世中佐王軍平賊的機會突然降臨，依李白一貫的性格抱負，該是十分興奮，就像當年玄宗召他入宮時一樣，可是他並沒有留下表現受辟召時興奮的詩，加以「扶力一行，前觀進退」的猶豫，更可見李白進永王幕府時並不顯得熱心。李白爲何會在可大展才華之機會前猶豫難決？此與他一貫之性格不合，因此，可以肯定，他當時已知永王東下是違反肅宗之命。但此種機會，又是李白一直盼望着的。並且永王是以平亂掃胡爲號召，東下也是玄宗所定大計，因而李白亦不由得心動。在他躊躇不決之時，永王又限期催促，「辟書三至，人輕禮重。嚴期迫切，難以固辭」（與賈少公書），李白終於應召而出，由於永王曾下限期催促，於是李白事後有「脅行」的解釋，並非完全沒有根據。

李白最後既決定佐永王，他所認同的便是玄宗命令，這在上列詩中可見。當時局勢既相當混亂，肅宗並不一定可擊敗叛軍，李白的隨永王抗敵，是出於雙方（肅宗與永王）都在抗敵的心理，他想不到政治上的謀奪會發展到非常嚴重，因此在他進入永王幕府初期，他的「永王東巡歌」、「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」諸詩，才會表現得那樣樂觀。

永王敗亡時，李白已五十七歲，身受繫獄之苦。他的不幸是陷入一個複雜的政治紛爭中。後人爲了替李白洗脫跟隨永王的污名，便引伸出幾種不同的歧見。但永王被判爲逆臣，是肅宗朝的觀點，後人要判斷的應是——李白入永王幕是基於甚麼心理？從上所引詩中，可理解李白純爲平亂立功，全無背叛皇朝之意，李白根本就不該蒙上污名，又爲何硬給他加上污名而又再爲他洗脫？「蔡寬夫詩話」謂：「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，蓋其學本出縱橫，以氣俠自任，當中原擾攘之時，欲藉以立功名耳……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，固未必有成功，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」，可謂持平之說。

李白一直企盼的，是在政治上舒展才華、立名濟世。大亂初期，他雖到廬山隱居，却是抱着無可奈何的心情在「猛虎行」中說：「旌旗纓紛兩河道，戰鼓驚山欲傾倒。秦人半作燕地囚，胡馬翻銜洛陽草」，但「有策

不敢犯龍麟，竄身南國避胡塵」，他便作避亂打算，繼而又說：「楚人每道張旭奇，心藏風雲世莫知。三吳那伯皆顧盼，四海雄俠皆追隨。蕭曹曾作沛中吏，攀龍附鳳當有時。」可見李白之去避亂，却非甘心歸隱，只認為是形勢所迫。在他離宣城時，有「經亂後將避地刻中留贈崔宣城」描述當時遍地兵亂：「中原走豺虎，烈火焚宗廟。太白盡經天，頽陽掩餘照。王城皆蕩覆，世路成奔峭。四海望長安，頻眉寫西笑。蒼生疑落葉，白骨空相弔。連兵似雪山，破敵誰能料。我垂北溟翼，且學南山豹……忽思剡溪去，水石遠清妙。」詩中表露對朝廷的破敵毫無信心，就想到退隱。安祿山初舉兵時，勢如破竹：「海內久承平，百姓累世不識兵革，猝聞范陽兵起，遠近震駭。河北皆祿山統內，所過州縣，望風瓦解，守令或開門出迎，或棄城竄匿，或為所擒戮，無敢拒之者。」（通鑑紀事本末安史之亂），安祿山稱帝後，逮捕了不少官員，其中就包括了詩人王維、李華、儲光義等。李白雖灑脫豪放，但仍重視自己名節，只好暫作歸隱。他的「扶風豪士歌」：「洛陽三月飛胡沙，洛陽城中人怨嗟。天津流水波赤血，白骨相撐亂如麻。我亦東奔向吳國，浮雲四塞道路賒。……張良未逐赤松去，橋邊黃石知我心。」仍透露着無可奈何而有所待的心境。

李白一直固執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的信念，認為自己既滿腹經綸，便應得到在政途上施展的機會，因而在詩中就一直顯露未能熄滅的抱負理想，可以說他一直都不甘心，但現實却一次又一次的使他失望。在早年的不得志，仍可「東山高臥」的以等待來安慰自己，直到永王辟召，雖有因永王的處境而躊躇難決，但最後的決定，却有孤注一擲的意味，這就是因他的不甘心才冒險而出。

李白其實亦懷濟世抱負，只是他的抱負一直都從自身出發，表面上似乎為關切百姓的少，為能施展自己才華的願望居多，但李白同樣有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的理想，而學優則仕便是當時兼善天下的途徑。李白在「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」中已表示：「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一身」，在抱着此種理想的讀書人的意識裏，「兼濟天下」應是關懷國家百姓。李白對天寶末年玄宗的昏庸，佞臣的禍國，以及大亂前危機的痛心，無可否認，他對國家百姓同樣存有關切之情。只是他將自己能否被用

放在第一位，而對於能否匡扶社稷百姓却要視乎自己是否被用。可是他始終不得志，於是怨憤、憂鬱、遊仙等悲觀心情便逐漸擴大，因而他的詩常給人脫俗高蹈的感染，甚少表現歡樂滿足的心境，而是一種世間無奈的飄忽。

李白的較個人化表現，從他早年的思想脈絡看來是正常必然的：「十五遊神仙，仙遊未曾歇。吹笙吟松風，汎琴窺海月。西山玉童子，使我鍊金骨。欲逐黃鶴飛，相呼向蓬闕。」（感興八首其五），「雲臥三十年，好閑復愛仙」（桃花巖寄劉侍御綰），三十歲隱於岷山數年，他的出塵灑脫使賀知章見而即呼「此天上謫仙人也」！可見李白在接觸政途前已有濃重的超凡出世思想。所謂「功名富貴若長在，漢水亦應西北流」（江水吟），以李白此種思想推論，神仙的嚮往自然比社稷蒼生更為使他繫心，因而他的表現多是傾向於自我。

李白以他的飄逸不羈、曠世奇才，千古譽為詩仙，然而他的生活却沒能夠：「永隨長風去，天外浴飄揚」（古風其四十一），雖然他一直在表現曠達：「人生達命豈暇愁，且飲美酒登高樓」（梁園），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（將進酒），可是憂憤、無奈、失落才是李白真正的傷心懷抱。

李白向着超凡脫俗的方向走去，然而却是一步一回頭，注目於以為使他大展才華的功名。這是他矛盾的癥結，亦是他的不能全心關注社稷蒼生的主因。

宋人軼事彙編（上下冊）

丹徒·丁傳靖輯
（含稅）
售價二八四元

本書為民國廿四年本館初版於上海，五十五年曾發行臺一版，今重加付梓。全書凡二十卷，共一百卅六節，輯錄宋一朝六百餘人之軼事遺聞，引書五百餘種，取材自史傳與宋人詩文集，旁及各種筆記小說、詩話詞話、墓誌碑銘、方志雜史等，讀來逸趣橫生，親切有味，為研究宋史及宋人傳記之重要材料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